

【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专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科化再探索*

——从经济共同体到共同体经济学

李曦辉

摘要:建立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体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是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的关键所在,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坚持“两个结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实践进行科学分析。历史实践证明,经济力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续发展与壮大,也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推动生产力持续进步。可以说,中华民族是靠文化凝聚的,更是依靠经济一体来推动的。共同体经济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完善对经济行为与绩效影响的学科。共同体经济学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独特性质和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研究经济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与完善双向互动的机理与实践。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科化;共同体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5)01—0012—11 **收稿日期:**2024—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及其国际比较研究”(19ZDA173);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对口支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4GLA001)。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人类共同体是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关心的重要问题。19世纪中叶,马克思创造性地发现了唯物史观,即生产力是决定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然而,由于缺少可观察的对象,马克思提出的唯物史观一直缺乏原始社会史的案例支撑。正是在同一时期,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没有与马克思相互借鉴的情况下,也从人类学路径上发现了唯物史观,并出版了著作《古代社会》,他通过对美洲印第安原始部落的观察,总结出了支撑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案例。马克思非常关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在晚年仔细阅读了《古代社会》,做了详实的读书笔记,并写出心得。不幸的是,马克思没能为唯物史观找到现实依据就憾然离世了,恩格斯毅然接手了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写出唯物史观领域开创性的

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唯物史观提供了理论与案例的支撑。按照恩格斯的归纳,人类自始都是存在共同体的,否则无法抵御自然界带来的危害。人类共同体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体现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的形式,其认同方式也是从血缘认同、地缘认同、文化认同到世界大同。恩格斯的研究是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参照,以欧洲社会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它可能存在观察对象不够宽泛的局限性。因为,中国在民族和国家之间还存在一种人类共同体,就是民族共同体,也叫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3年10月2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具体

学习时鲜明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习近平，2024）。这其中，建立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体系是核心，其他诸如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都是为学科体系形成和完善服务的。为此，我们要积极探讨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的学科体系，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服务。

一、民族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对民族视域下的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类共同体认同有过很多论述，这些论述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1. 生产力发展与人类共同体演进

人类共同体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类共同体不断演进到高级阶段。恩格斯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等，2009）。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满足的需要，被新的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取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等，2009）。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阐释了生产力进步带来了社会分工的变化，从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分工中，可以发现人类共同体的演进脉络。“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样一来，在古代的氏

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起来与氏族对抗了”（恩格斯，2018）。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城市的对立与乡村的特殊需要，都要求要有新的机构；但是，每一个这种集团都是由属于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甚至还包括外地人在内；因此，这种机构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形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恩格斯，2018）。这样，“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领土，也就成为必要的了”（恩格斯，2018）。其实，革命导师早在100多年前已经为我们阐释了生产力进步对于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也解释了民族形成的路径与过程。

2. 人类共同体演进对生产力进步的影响

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不仅对人类共同体的演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人类共同体的发育程度也会对生产力的进步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讲过：“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等，2009）。就像后来他们在研究世界的交通与商品流通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近50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快捷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网。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1847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12个月，现在已经减少到12个星期”（马克思等，2009）。在革命导师提出世界交往有利于生产力进步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类的交往程度确实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光是不同特色的全球化就已经经历了三个波次。第一波是英国推动的全球化，典型的代表就是殖民地，先行的工业化发达国家纷纷在欠发达的地区寻找地域范围足够大、人口足够多的国家作为自己的殖民地，目的主要是掠夺原材料和提供倾销产品的市场。然而，这种全球化方式是

有悖于人类公平与伦理的,特别是像贩奴这样的行为,是受到广大殖民地国家反对的,在其后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中,英国版的全球化以不光彩的结局谢幕了。第二波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它吸取了英国全球化的教训,不再搞殖民地版本的全球化,而是通过价值观输出,希望全人类都接受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价值观,通过思想的认同来实现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市场的共同化。然而,美国版本的全球化也是一厢情愿,它没有考虑各个国家的不同国情,导致许多国家在实现全球化的进程中迷失了自我,非但经济没有发展,自身的民族国家还面临着分崩离析,这种全球化目前正在惨淡收场。以包容性为特征的全球化中国版本在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已经悄然登场,并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一带一路”倡议让许多欠发达国家经济得到复苏与启动就是鲜明的例证,目前中国版本全球化正在悄然推广,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青睐。

纵观历史,无论哪种版本的全球化,都起到了促进生产力进步的作用,只是前两种全球化过分强调一元唯一,没有惠及大多数国家而没能较好地生存下来,中国版本全球化因为多元包容性而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认可,具有美好的发展前景。为此,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类共同体的规模扩大,直接推动生产力的进步。

3. 中国民族演进的独特规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恩格斯说过:“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恩格斯,2018)。原始社会以后,“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恩格斯,2018)。首先被打破的就是氏族。关于氏族,是“组成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从这时起,这种集团就由于其他共同的社会和宗教的设施而日益巩固起来,并且与同一部落内的其他氏族区别开来了”(恩格斯,2018)。其次就是打破了胞族和部落。关于胞族和部落,“因为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存在。”摩尔根所看到的胞族,是“每三四个或更多的氏族联合成一个特殊的集团”(恩格斯,2018)。打破了原始共同体,人类就需要一种与生

产力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共同体,以维持人类的生存,于是产生了民族。关于民族,“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更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单一的民族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恩格斯,2018)。以此协调共同体成员的行为。

恩格斯认为,古代氏族制度“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财富被当做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恩格斯,2018)。恩格斯基于对欧洲人类历史发展观察得出了结论,表明国家是私有财产和共产制无法调和的产物,社会主义以前的国家,就是有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类共同体认同只能停留在民族这一共同体中,要想扩大认同范围,就只有通过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恩格斯,2018)。在国家消失以后,人类社会就会实现大同。

中国的人类共同体认同却与西方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中国在民族认同之后又发展出了民族共同体认同。与此同时,在“整个西方,还是民族与国家之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只有中国及早完成了‘民族国家’之体制,即由一个民族来创建一个国家,由一个国家来转成一个民族之体制”(钱穆,2012)。一个国家转成的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辞海》的解释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即“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二、经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华各民族由于经济活动的推动,不断增加相互接触,增进彼此了解,最终转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以说,经济力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 经济网络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许倬云认为：“中国内部没有分裂为若干独立国，其缘故一则在于文化的凝聚力，一则在全国性经济交换网继续的扩展，不断将全国吸入一个整合的经济结构。然而各地区的地理特色及其在全国政治与经济体系上的相对地位，终究会造成若干区域性的分歧，从而影响若干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发展过程。”只是“在空间平面上，中国的各个部分，由于若干中心地区，放射为树枝形的连线，树枝的枝柯，又因接触日益频繁，编织成一个有纲有目的网络体系。几个地区的网络体系，逐渐因体系的扩大，终于连接重叠，成为更庞大的体系”（许倬云，2006）。经济网络对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就像梁启超认为的那样：“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频繁竞争最烈之时代。”“主要者，则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与汉种竞争，而自形质上观之，汉种常失败，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梁启超，1925）。

中国的经济网络形成时间已久，早在农牧竞争激烈时期，地区间的经济网络已经织就，并且无论区域间发生战争与否，这种已形成的经济网络都没有受到影响，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支持力量。费孝通认为：“把游牧民族看成可以单独靠畜牧业生产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他们所要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及酒等饮料，除了他们在大小绿洲里建立一些农业基地和手工业据点外，主要是取自于农区。”“农区在耕种及运输时需要大量畜力，军队里需要马匹，这些也绝不能农区自给。”“因而后来把农牧区之间的贸易称为‘马绢互市’和‘茶马互市’”（费孝通，1989）。需求不仅是单方面的，农耕地区需求的马匹、皮毛等物品，也主要是依靠游牧地区提供，两地结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2. 经济交流互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的地理环境特征，引致了特有的经济分工，并由此形成了地区间的互补关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陈连开认为：“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使中国的民族与经济

区域分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东西两大部。即秦岭——淮河以南是水田农耕民族和水田农业发展带；此线以北到秦长城以内（包括辽东、辽西）为旱地农耕民族与旱地农业发展带；秦长城以外为游牧民族与狩猎民族发展带。这三带天然划分又天然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曾开凿过中国南北大运河那样的运河，也不曾像中国那样在古代发展农牧以及在农业各个区域之间进行商品交换。这种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内在联系，是中国众多民族越来越巩固地发展为一个国家的重要根源之一”（陈连开，1989）。许倬云也认为：“由先秦开始，中国已有核心区与边陲区的不同发展。”“边陲区的经济发展，往往比较落后，因此一方面可能有地方性若干程度自给自足的性质；另一方面，边陲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劣势，其资源与财力会被核心区吸引”（许倬云，2006）。使得中国的区域间经济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早在中华大地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竞争的时代，为了对付匈奴带来的威胁，华夏集团就邀请本不属于本集团的楚国加入其中，并推举楚国做了华夏集团的盟主；后来本不属于华夏的秦国也是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早期特征。后来，汉唐则是放开了长城屏障，使得华夏大地的农耕与游牧实现了统一，有效应对了欧亚大陆西端古希腊罗马竞争带来的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凝聚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到了远洋航海时代，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也与内地农耕游牧地区融为一体，有效应对西方远洋航海带来的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凝聚。总的看来，在外部竞争来临的关头，中华民族都没有分裂，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威胁来临之前各个地区因分工而结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一旦遇到外部挑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内凝聚应对挑战，而不是各自分裂应对危机，这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的经济原因。

3. 经济居先文化一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文化学者葛兆光认为：“一部中华文化史固然是在叙述中国的文化（包括族群、宗教、语言、习俗、地域）如何在历史中形成与流变，但也需要叙述这些原本散漫复杂的文化，究竟是如何逐渐汇流并形塑出一个叫做‘中国’或‘华夏’的国家来的。”因为“‘中国’从上古时代起，就是由水稻、小米、牛羊多

种生产与生活方式,由东北辽河红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与汉水如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类型文化共同构成”(葛兆光,2015)。在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经济活动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的(李曦辉,2018)。“数千年来我国各民族之间为了达到经济生活上的相互需要而彼此交往,相互补充,绵延不断,最终把我国各民族生活的内在需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中华大地各族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灿烂文明”(本书课题组,2013)。

中国是一个农耕国家,但并不代表没有对游牧经济与商业经济的需求,只是这种需求的满足不是用战争和掠夺的方式实现的,而是靠经济交往和文化认同的方式实现的,这种方式带有鲜明的和平特征,容易被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并逐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代,就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的需要,这足以证明当时六国的经济往来已经十分密切了,所以才有统一各方面规范的要求,其直接目标是为经济交往提供方便,实际上却起到了塑造统一中华文化的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自那时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匈奴的袭扰,决定采用匈奴的胡服,训练士兵骑马射箭,起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作用。之所以能够想出胡服骑射的办法,就是因为赵国在与匈奴进行侵扰与反侵扰斗争中,并没有中断与匈奴的经济往来,对匈奴的生产生活以及战争工具都了如指掌,所以才有了胡服骑射的胜利。实践证明,汉族与匈奴经过战争、经济交往,实现了文化一体,最终都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贡献力量。

4. 国际经济竞争、全球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国际经济竞争和经济全球化是很早就有的发展趋势,它从人类文明社会开始一直伴随至今,对人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人类文明最早发源于欧亚大陆,一端是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欧洲文明,一端是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文明,波斯文明则是介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中介文明。自欧亚大陆进入文明时代,就开启了一个经济竞争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秉持农耕文明,不断形成并向人类传播和平共处的文明方式;古希腊罗马文明

凭借游牧商业文明的力量,不断占领新的草场与市场,希望自己的文明方式广泛传播。表现在经济上,就是不断把自身的生产方式向外推广,以期收到规模范围效益。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文化的同一化,也就是操同一生产方式的人群也要认同同一种文化,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顺畅运行,产生比较效益。文化的一体,必然带来民族的认同与凝聚,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完善。

中华民族得以凝聚为一个整体,其中经济交往与分工作用至关重要。自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西征犬戎,开始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贝壳等物品交易西域的皮毛等物品,经济方面就有了接触;到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交往就越发密切;到后来的朝贡体系时代,中外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这样的经济交往不是以各个地区为单位单独进行,因为不会形成经济方面的优势,而是将国家组成一个个经济活动的单元,通过分工与地区间的相互联结,从而形成比较优势。在追求经济优势的过程中,各地区自发地联结成了经济网络,最终形成了经济整体,并在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共同体经济学

经济活动的深入开展,各地区经济联系的不密切,自然会使得人们凝聚成不同规模的人类共同体;同时,人类共同体的持续形成与壮大,也会对经济活动形成影响,还会推动生产力的持续进步。

1.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鼓励分工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经过千百年来磨合而形成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只有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需要人类结成越来越大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才能逐渐发展起来,并最终融汇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像民族学家谷苞所说:“在历史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战争虽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游牧社会不能生产出自身所需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需要由农业社会供应各种手工业产品——金属工具和用具、丝绸、麻布、酒类及粮食等;农业社会也需要游牧社会供应牲畜、皮张、畜毛等,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业区经济与游牧

区经济的结合,才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统一的整体”(谷苞,1989)。

中华民族能够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领先世界,能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返世界优秀民族之林,这些都得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形成,得益于共同体内多元一体的构成,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完美的分工。如上文所说,中华民族共同体主要来源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经过千百年的磨合与接触,这两部分实现了融合,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农耕与游牧开始了合理的分工,创造了先进的生产力,是那个时代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使中华民族在古代就走到了世界民族的先进行列。由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与欧洲民族比起来欠缺商业文明成分。然而,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商业文明的成分也逐渐融入。随成吉思汗西征并来到中华大地的阿拉伯人后裔与中国人结合而成的回族,就拥有商业文明的基因,其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就让中华民族共同体因融合开放的特征而具备了完美的商业文化基因。建立在这种民族融合凝聚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最能实现分工效益。

2. 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了规模范围效益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共同体伴随而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统一的大市场,享有了巨大的规模范围效益。“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国的疆域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片:地跨黄河、长江、珠江的农业区是一大片;长城以北的游牧区是一大片;青藏高原及其邻近的游牧区又是一大片。这一大片农业区和两大片游牧区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同时并存着互不相同的生产体系。在汉朝设置西域都护以后,我国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成了一片,这时我国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界线,从长城以北到天山以北长达数千公里。农业区与游牧区都各有自己的特有产品,是对方所没有的或缺少的,因而也是对方在生产生活上所迫切需要的”(谷苞,1989)。只有融合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同一个国家和统一大市场之下,中华民族经济才能取得最大的规模范围效益。“蒙古作为‘藩属’被清朝统治了300年。300年中,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广大牧区以外又出现了成

片的农业区,农业区的出现对于克服牧业生产脆弱性和弥补牧业生产的不足,大有利益”(贾敬颜,1989)。这可能是一种独特现象,中华民族各组成部分在文化上的认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只有在一个一体认同的人类共同体之下,才会有农业与游牧业的和平相处与经济互补,才会带来巨大的规模范围效益。历史经验证明,“中华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在古代始终是呈现多元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反复汇聚于中原,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发展高峰;同时,又以高度发达的中原经济、文化向边疆地区辐射与扩散,促进边疆既同步又不平衡的发展”(陈连开,1989)。内地与边疆经济的紧密联系带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支撑力量,通过中华民族共同的形成与发展,实现越来越大的规模范围效益。

3.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创新特性

创新既是一种现实存在的行为,也是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如果从对传统习惯的颠覆性认知入手,就可以解释一些先前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熊彼特发现:“经济当中当然也有像血液循环那样的变化,但也有另外一些变化,它们一看就是不连续的而且突破既有框架,也就是传统路径本身。虽然说这些变化属于经济范畴,经济理论也有义务将它们解释清楚,但针对循环之流所做的分析,一条也解释不了这些变化的原委。”“如果有待研究的问题只不过是,搞清楚发展及其历史结果是怎么回事,找出某个经济状况或某个特定问题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但凡在这些场合,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理论的作用几近于无。”“来自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的人,会因为习惯、风俗或者除经济以外的其他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在经济方面表现出不可弥合的差异。”“理性、自我中心当然主要是用来刻画企业家的经济活动,但其烙印也深深打在了随之而来的道德、文化及社会后果上”(熊彼特,2015)。熊彼特认为,创新需要从五个方面进行把握,即采用消费者还不熟悉的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开拓新市场,开拓新原料或半成品供应基地,在任何产业中采用新的组织(熊彼特,2015)。

中华民族是由采用不同生产方式的群体构成的,既有农耕群体,也有游牧群体,后来还加入了经商的群体。这些群体提供的产品是其他群体所不

熟悉的,比如对农耕群体而言,马匹除驭车外的功能,就是大家所不熟悉的;对于游牧群体来说,粮食的生产、酒类的制作、手工产品的生产,也是他们不熟悉的。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成,大家彼此学习他人的优长之处,对于自身来讲就是创新。对于农耕而言,精耕细作是其原本的生产方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游牧来讲,逐水草而居是其原本的生产方式,精耕细作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新鲜事务。只是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将中华民族凝结为一个整体以后,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才传播到了游牧群体之中,农耕群体也学会了利用马匹实现生产要素的快速移动,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也是一种深刻的创新。在农耕区域采取乡村这种组织形式,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在游牧区域采取部落这种组织形式,便于组织牧民的快速有效移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成以后,游牧群体学会了农耕群体的精细化组织,产出了一些原本无法生产的产品;农耕群体学会了生产要素的快速移动,比如胡服骑射就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综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促进创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生产力居于重要的地位,是社会进步的核心推动力量;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辅相成,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实现辩证统一,才能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

1. 生产力发展的支撑作用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即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及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关于生产力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这样描述的:“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马克思等,2012)。也就是说,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一定的人类共同体与之相适应,或者说,一定的人类共同体只能容纳与之相适应的

生产力水平。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早期,也就是在秦汉以前的夏商周时代,中央政府大量分封诸侯,形成了封建社会。那时的核心权力在诸侯,中央政府掌握的权力有限,相较之下,人类共同体的认同规模范围较小,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范围效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秦汉以后,由于农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对人类共同体的要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秦朝统一六国,中华大地开始了向统一的中华民族凝集的进程,人类共同体规模范围稳步扩大;近代随着工业化进程在中华大地启动,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华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之相伴随人类共同体的认同也发展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纵观历史,利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生产力进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核心推动力量,只有生产力的持续进步,才能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

2. 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进行经济生产活动中所建立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它涉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基本政治信仰,影响着各个群体的利益和幸福。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关系是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缺一不可。人类社会形成的共同体认同,基于不同的生产关系,会形成不同的认同方式。比如西方社会,由于其社会来源于游牧文明与商业文明,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防范的,每一个人都把其他人当做敌人来看待,而不会与他人形成和睦的关系。只是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以后,迫于生产力发展的压力,西方人类社会才在斗争与压迫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这种人类认同的共同体,大家在民族这个人类共同体之内共享利益和改造自然的成果,但对于民族之外的其他人,则是采取剥削与掠夺的形式,目的是民族群体内利益最大化。中华民族起源于农耕文明,这种文明的特征就是和睦共处,大家各自拥有自己用来耕种的土地,独自从事农耕活动,彼此互不相扰,村庄之内一团和气。农耕文明的特征就是各自耕耘,各自收获,互不干扰,不会把其他人视为敌人,才有了农耕文明时代农业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才一步步融合成了中华民族。这其中主要得益于中

华农耕文明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彼此和平相处、互相没有财产企图的文化传统,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生产关系也是与西方本质不同的,是和平的关系。

正是这种独特的生产关系,才让中华民族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生产力发展水平一直领先于世界,才使得中华民族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由超越西方民族国家作为利益单元的现实,发展出了能够容纳更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3. 生产方式变迁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

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是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系。一般把物质资料生产的物质内容称作生产力,把其社会形式称作生产关系,两者都是生产方式的建设性内容。换言之,生产方式是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能动统一。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谋取物质资料的手段不断发生变化,也就是生产力不断实现进步;同时,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实现生产关系的变迁。生产力生产关系不断实现交互性进步,生产方式也就实现了持续性变迁,其对人类共同体的要求也就出现了新的变化,要求人类共同体的规模不断壮大,人们认同的范围不断扩展,以适应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中华文明的早期,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是典型的个体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小农是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所以表现为当时的食物产出很少,无法满足人们对事物的需要;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们对食物要求的提高,人们学会了改造农田、兴修水利,食物产出水平显著提高,同时人类的认同规模范围也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进入工业化时代,分工、规模范围效益、创新成了社会经济进步的推动力量,而这些都要求参与经济活动的人类共同体规模不断扩大,于是出现民族国家,在西方文化传统下人类共同体认同达到了顶点;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文化基因还有继续扩大人类共同体认同的基础,还可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这是超越个体民族认同的更高层次认同。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随着生产力进步、生产关系变化而产生的生产方式变迁,会对人类的共同体认同产生推动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会得到长足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

会越铸越牢。

五、共同体经济学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分支与相关学科,共同体经济学需要认真研究,从而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发展的实践。

1. 研究对象与定义

研究对象的界定决定着学科发展的方向,也决定着学科存在的意义,研究一个具有重要时代影响的研究对象,其学科发展就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同时,学科发展需要民族文化的土壤,一种文化积淀定会产生与之相匹配的科学基础,也会诞生与之密切关联的学科。比如,亚当·斯密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就与西方文化积淀密切相关,因为西方文化源头的游牧与商业文明特征,使得他们注重个体的诉求,很少关注集体的利益,难以协调集体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微观经济学就主要关注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而不研究集体协调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中华文明源于农耕文明,我们的祖先遗传了集体主义基因,因为再强的个人也无法兴修水利设施,再有实力的个人也无法兴建人工运河,只有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为止,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学科多发源于欧美,是以观察西方世界的现实作为学科的出发点,对于西方现实解释较好,对于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解释性较差,许多东方国家照搬西方理论指导改革实践失败就是鲜明的例证,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实践,许多就是“方枘圆凿”,容易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

作为描述解释产生于中华大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学科,就应该源于中华文化,结合我们自己的特征,界定研究对象。共同体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完善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行为,以及对经济活动特征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独特性质。

2. 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范式,引导着科学共同体成员按照共同的范式开展研究工作,为学科发展贡献力量。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

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做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托马斯·库恩,2003)。如此看来,范式存在着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整合共同体内部成员的认识,形成精神层面的共识;另一方面就是提供规则和范例,供全体共同体成员来参照效仿,以此提高同一性,增进共同体的运行效率。共同体经济学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强调集体理性,注重集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与一致性,注重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学科理论选择方面,选择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就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共同体经济学选择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作为学科的指导理论,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二者有机结合,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完善。首先,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进步,强调生产力的进步是带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决定性力量;其次,生产关系的进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又带来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推动历史的进步,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的客观存在,就是我们研究的逻辑起点,用历史的事实,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与完善规律,用历史的客观存在,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3. 研究范围与边界

纵观世界,经济活动对人类共同体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因为经济活动的规模范围直接影响绩效,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范围,任何一种经济体都不可能市场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可以说结成越来越大的人类共同体,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然而,人类不是经济动物,不仅有利益诉求,人还有文化属性,每个人都受生长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应该说,人的行为更主要的是受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基于经济理性行事。这样的对应关系,使得人类必须结成越来越大的共同体,以应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由于文化地域性的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人类

共同体的规模不断扩大,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一种两难。要想突破人类共同体规模范围与文化阻碍的两难,就只有采取开放包容的姿态,在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不追求文化的一致性,而是采取多元包容的姿态,通过包容最终让文化走向一体,满足人类共同体不断扩大规模范围的需要。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共同体发展阶段进行过总结,归纳出了六个发展阶段,就是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因为具有文化包容性的特点,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又发展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支撑中国实现了人类共同体规模范围的最大化,支持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为此,共同体经济学目前的研究范围只能是中华文化所能覆盖的区域,待到中华文化示范作用扩展到世界范围以后,学科的研究范围也将扩大到与此相适应的世界范围。学科的研究边界,是研究经济发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与完善的机理与实践,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对经济活动绩效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都不在学科的研究之列。

六、学科发展与展望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有两种力量同时发挥作用,一方面不断走向全球化,另一方面人类文化越来越区域化、群体化。就像约翰·奈斯比特(1999)认为的那样,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处在相互矛盾而又相互依赖的两个过程之中:一方面是全球化与一体化,主要是经济、科技甚至某些物质文化的发展趋向全球一体化,另一方面却是多民族与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是作为民族及其文化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走向多元化。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融合化,要么就是全球经济不断多元化,这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约翰·奈斯比特,1999)。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共同构成了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对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有着具体明确的要求,就是生产力越发达,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越紧密,人类群体的规模范围就越大。可是西方理论主导的人类社会现实却不是如此。塞缪尔·亨廷顿

(1999)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分析,西方人普遍认为“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非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西方,特别是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垄断’行将结束”。塞缪尔·亨廷顿(1999)指出自古以来“中国经济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20世纪后半叶技术的扩散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使历史上的格局再现”。按照西方理论的指引,人类必将进入一种混乱的状态,而无法在现有格局下实现改良。

这种现实的产生有着理论渊源。自文明时代开始,欧亚大陆西边的欧洲就不断发生战争,为了消弭战争,促进欧洲经济社会的发展,欧陆国家签署了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有学者认为,1648年和约签署以后,国家领土主权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国家边界空间形态的演化受到国际法的限制。但是,人类本质上具有不断拓展经济行为空间的需求,在其领土空间控制的范围受到约束以后,这种经济空间的开拓行为就表现为经济交往空间范围的拓展(柳思思,2014)。为了给这种要求一个理论解释,在陆权理论以后,又产生了海权理论。自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人类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这一时代促进了远洋航行技术的进步,海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逐渐从毫无价值的存在变成了人类财富的来源地,世界逐渐进入海洋时代。由于是欧洲人引领了海洋时代,他们自然就有权确立海洋秩序。由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主导的海洋秩序,却对陆权秩序形成了挑战,即不承认民族国家是基本利益单元,希望整个世界要在海洋观约束下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自由的空间。格劳秀斯(2005)认为:“根据自然,海洋似乎是抵制所有权的。”“我们称之为头等重要的法则或首要的原则,其精神不证自明且永恒不变,即每个民族均可以与另一民族自由交往,并可以自由地与之从事贸易。”“自然法是正当的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本性的理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

道义上公正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这种理论上的冲突和两种理论博弈并实现了均衡,可能就是当今世界处于矛盾之中,人类全球化无所适从的根源所在。

为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中国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全球化模式,相较于现实版的西方模式具有了鲜明的和平与包容性特征,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与特征。这种模式需要理论支撑,这就迫切需要中国版本的全球化理论,作为诠释中国特有的民族共同体经济行为的共同体经济学,就是中国版本全球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认真研究,向世界推广。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4(3).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5]钱穆.文化学大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6]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 [7]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8]梁启超.中国史叙论[M]//《饮冰室文集》卷三十四.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 [9]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 [10]陈连开.中国·华夷·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M]//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 [11]葛兆光.《说中国》解说[M]//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12]李曦辉.论民族国家模式差异化的根由[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3).
- [13]《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课题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 [14]谷苞.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M]//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 [15]谷苞.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M]//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 [16]贾敬颜.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M]//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

- 社,1989.
- [17]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 [18]马克思,等.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9]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20]约翰·奈斯比特.大挑战:21世纪的指南针[M]//朱生坚,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 [2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 [22]柳思思.“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展[J].南亚研究,2014(2).
- [23]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M].马忠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24]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M].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Re-Exploration of the Disciplinarization i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From Economic Community to Community Economics

Li Xihui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independent discipline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work for casting soli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oblem that China's ethnology research is influenced by Western ethnic theoretical thoughts and discourse systems. We need to proceed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adhere to the "two combinations" to scientifical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ata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Historical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economic powe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ntinuous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economic activities, promoting continuous progress in productivity.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not only cohesive through culture, but also driven by economic integration. Based on this, we propose community economics, a discipline tha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on economic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Community economics take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nd adheres to the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search method to study the mechanism and practice of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Disciplinarization; Community Economics

(责任编辑:平 萍)